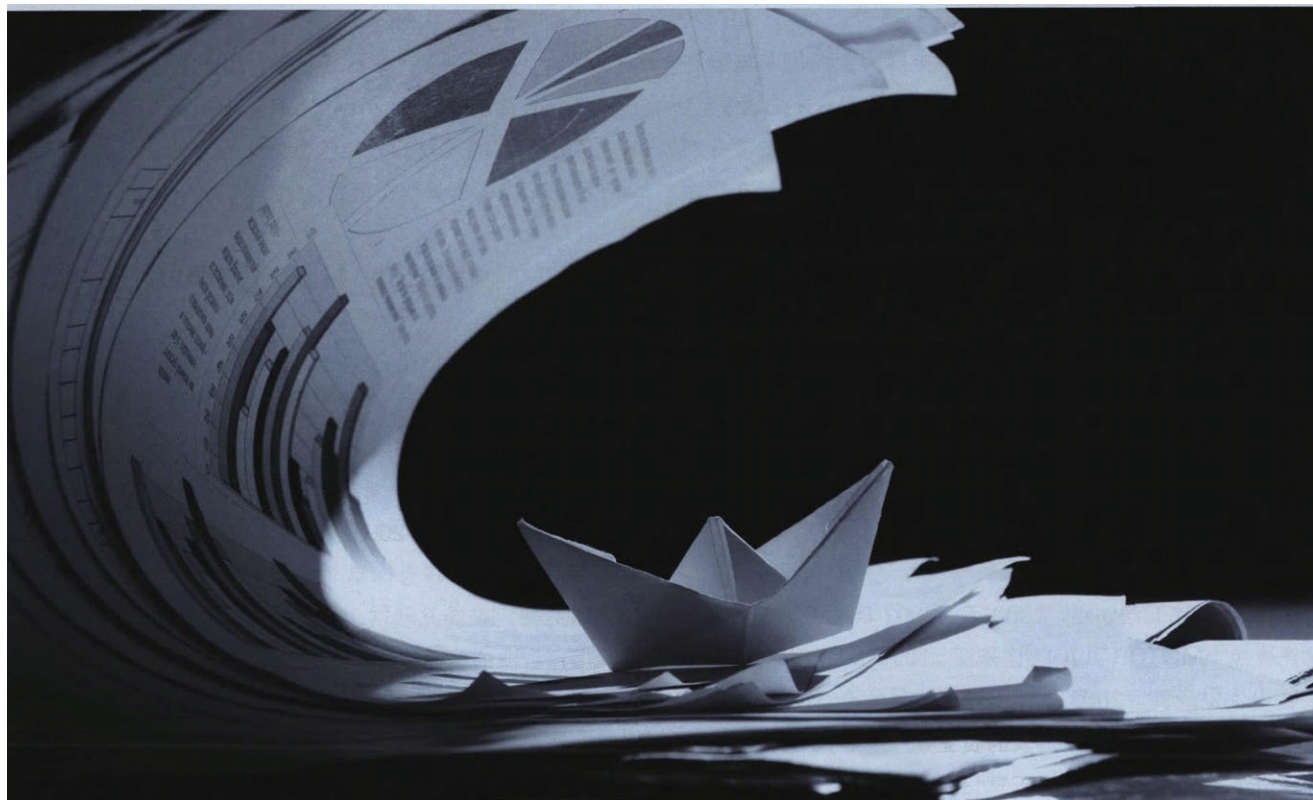


金融的力量

——荷兰的崛起与衰落（下）

文 / 方 晓



荷兰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金融体系，但荷兰在上层建筑方面，没有进行有意识的改革。各个大商人集团仍顽固地坚持着商业城邦时代的统治格局，他们对于臣服于某个政治

权威具有先天的恐惧和排斥，这种恐惧源自于对西班牙统治时代王权侵吞私权的可怕回忆。他们是商人，只关心利润，利润就是一切。从发展海运再到建立股份制企业和各种金融创新，

都只有一个目的——盈利。于治国理想而言，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希望杜绝暴君的出现，只希望维持一种威尼斯城邦的商人统治联合体。

在利益团体的操纵下，荷兰既没

有像 100 年后的美国一样，将松散的联合省集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也未能像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一样，实行君主立宪，明确王权与商人利益的法律界定，实现融合发展。庞大的帝国顷刻间倒塌了。

浅层的重商主义

马克斯·韦伯指出：“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而 17 世纪经济民族主义在欧洲的体现就是重商主义的盛行。

中世纪晚期，城市作为“商业聚落”逐渐崛起，新兴的市民阶层迫切地需要足量的货币以满足其日益强烈的交换需求，而新兴的民族君主也逐渐与产业市民达成利益联盟，争取后者在金钱上的支持。商业资本必然要求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对外贸易或掠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17 世纪中叶，荷兰共和国的贸易霸权达到顶峰，贸易收入源源不绝流入国内，但是荷兰的重商主义也未能跳出早期思想的藩篱，当权的商人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海上贸易和转运业务，虽然造船业独步天下，但国内工业发展也主要是服从于短期的商业利益。与西班牙一样，由于没有工业的沉淀，大量荷兰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因此无法继续扩大生产与消费，也就是内需不足。积累的资金虽然没有和西班牙一样变成王室消费和宗教战争，但也大多变成了商业投机，造成了金融业畸形发展。

而同期，以威廉·佩第为代表的英国重商主义者，针对英国直到 17 世纪中叶在贸易、制造和航海等诸多领域的落后局面，给国王开出的经济方案是，以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与保护政

策来孵化、培育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并促进其升级。其逻辑在于，使国际贸易必须优先于国内贸易，必须保证贸易顺差；在欧洲各国发展生产的情况下，保证顺差的前提是要从事高附加值的劳动；为了提高附加值，必须在封闭的贸易体系中充分利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并推进技术进步。

1651 年的《航海条例》忠实地体现了上述思想：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用英国的或生产国的船只运输，禁止外国商人染指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这实质上赋予了英国商人和船舶殖民贸易经营的法定垄断权利。同时，某些殖民产品及重要战略物资，只能从原产地直接出口到英国或英国殖民地。

英国人不惜与荷兰进行三次战争推行《航海条例》，这使英国对外贸易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大西洋商业体系。严格的贸易控制不但维系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运转，还为英国换回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工业原料，航运、港口和商人从中颇多获益。1700 年，英国航运量占世界航运能力的五分之一多，荷兰却超过了四分之一。但到了 1820 年，英国的份额已超出 40%，荷兰的份额则下降到了只有 2%。

在贸易流转自成体系的基础上，英国开始以举国之力扶植新兴工业。为了发展毛纺织业、消灭荷兰在这一领域的长期优势，英国人做到了“丧心病狂”——他们严格限制向荷兰出口羊毛，利用关税政策阻挡荷兰羊毛制成品进口，不惜重金挖来荷兰技工人才。在很短的时间里，到 18 世纪初，羊毛纺织品的出口就占到英国出口总收入的一半。通过举国体制，英国在

全球经济中控制着当时劳动附加值最高的行业，把掌控的亚洲和美洲殖民地变成了原材料产地和潜在的市场，殖民地、贸易、工业、军事开始形成良性的循环。18 世纪下半叶，当荷兰经济举步维艰时，大英帝国已经启动了工业革命的隆隆蒸汽机，一骑绝尘而去。

总之，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才摆脱了囿于流通环节的窠臼，开始关注生产环节的本质，取得了最终的典型形态。英国对荷兰的经济胜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制度的胜利、一种思想的胜利。

金融的早衰

实体经济弱小的荷兰，其金融优势的消失也是必然事件，更何况，早熟的金融体系自身的暗疾也有很多。

荷兰虽然在全球首创了证券市场，但却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无法有效利用这个工具。长期以来，当地证券市场没有新的本地大公司上市，只有联合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两只重要的股票在交易。而作为台柱子的东印度公司，其股本在整个公司存续期的 200 年间几乎没有改变，从未发行新股来增加投资，反而是依赖于留存收益再投资。垄断东印度公司股本的十七绅士（董事会虽由七十多人组成，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只有十七人），无意于扩大联合股份企业的公共基础，使得充满创新意义的股市机制成为了商业权贵的小型俱乐部。

国债方面，荷兰不像法国和英国的集权政治体制，由于分散化的政治性质，基本上没有集中发行的国债。荷兰的政府债多为省级或城市级别债券，只在当地流通，分散在各个城市，市场小且流动性差，连荷兰本地人也



只能投资外国债券。18世纪,英国和法国债券持续增长,荷兰报纸上经常会列出法国债券、英国统一公债的价格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股价、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价,但很少有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的债券或者股票的价格。

政治的松散联盟下,更是难以形成正式的央行体制,阿姆斯特丹银行虽然实现了汇兑的国家化,但未能进一步完成央行的其他两个功能,即制定货币政策以及成为商业银行的银行,金融调控更是无从谈起。

而在海峡的对岸,被拿破仑嘲讽为“小店主”的英国人却很好地组合了上述元素。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王室财政变成了国家财政,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公债,改变了政府的融资方式,并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使英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货币市场。国债体系和货币市场在给政府提供更方便、廉价的融资的同时,也与英国的工业革命融合发展,奠定了伦敦金融霸权的坚实基础。

18世纪末,在联合东印度公司倒闭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重要性就

开始消退。本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外国债券渐渐转移去了市场更成熟、更便利的伦敦。失去了最后的钱袋子的荷兰彻底沦为欧洲的二流小国。

无止境的投机浪潮

18世纪中叶,曾经辉煌的共和国只剩余晖,房龙在《荷兰共和国的衰亡》一书中如此描述此时的荷兰人,“整个民族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宁可经受饥荒、围困和瘟疫也不屈服于外来的意志和外来的教会。他们也堕落了,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一大帮富裕和自我满足的吃利息者,其充沛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已丧失。”

从腌制鲱鱼,到欧洲航运,再到殖民地贸易,再至开辟金融通道,荷兰人发现了更加轻松的赚钱门路,于是“理性”十足地投身其间。很多荷兰人从事投机活动、证券买卖、放高利贷等,更多的人是将富余的资本投资海外,因为国外的债务利率高于荷兰本土的利率。“当在国外十拿九稳可以得到6%或7%利润的时候,便不会以4.5%或5%的预期利润在国内投资……贸易和工业开始不再被看作是

‘时髦的事情’了。”

正如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精神核心的入世禁欲主义是一种“常求善又常生恶”的力量。“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甚至1635年黑死病带来的死亡恐惧也没有阻碍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疯狂追逐和癫狂。荷兰,这个“第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给我们十足地预演了在资本主义拜物教下的人格异化。

没有理由嘲笑荷兰共和国的堕落,因为历史只会嘲笑更为不堪的步后尘者。法国的密西西比狂热、英国的南海泡沫,20世纪的一连串经济危机,以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逐渐剥除了其原有的伦理涵义,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而早已驶离新教伦理栖身港湾的资本主义,在机器崇拜、消费冲动、金融创新的武装下空前强大,早已经将人格收入为它的禁裔。这正印证了韦伯的著名悲观预测,“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这似乎就是资本主义方式不可克服的伦理矛盾。

荷兰的兴衰,正如历史天空划过的一道流星,辉煌的轨迹短暂而美丽,留下的是恒久的追思。回首五百年,荷兰共和国的历史正如一枚泛着暖色的琥珀,那里浓缩着它的成功与失败,每一丝纹路,每一个气泡,都凝固着资本主义文明在这个时空里曾经发生过的一段蜕变。■

(作者单位:中央结算公司)